

近代中国的文化困境与文化使命

——从近代中国文人之死看中国文化

林春田 张海涛

摘要: 在历史文化语境的不断变换中,人之现世生存的价值问题,濒临价值的凌乱与虚无生命何往的问题仍一次次以中国近代文人自杀的形式提示着它们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确乎到了认真思考自己现代使命的关头。仅就世价值信念看,时下热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潮都难以成为汉语思想真正的现代使命。把个我的在世性价值交付给现代性授权的权威,人固然有了一个庄严的归属,却也不堪其重,在深重的压抑感中,人们呼求自由。在后现代生活空间里,人以肉感的沉醉取消价值追寻的高蹈,卸下满身的重荷狂歌曼舞却时感悬着浮游的恐惧、无家可归的冰冷,又无法不在无法承受之轻中渴慕归属。中国文化的现代使命既不是思考如何禀有提供现世沉重的权柄,也不是探求如何使人置身失重的游戏空间,而是为现世提供一个足可承负人的在体性裂伤,足可抱慰徘徊在价值虚无的边际孤苦无告的靈魂的真实价值信恃。

关键词: 近代中国;文化困境;文化使命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09)1-050-03

作者: 林春田,鲁东大学文学博士,山东,烟台,264005/
张海涛,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

刘小枫在《诗化哲学》中说到:“诗人自杀是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内在事件”,的确,20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中向来用以抱抚人心、安顿灵魂的价值信靠再也难以宁息诗人内在精神的凌乱。在西方,当上帝遭弃、众神隐遁,人们试着在价值虚无的深渊徜徉之际,特拉克尔自杀了,杰克·伦敦自杀了,克劳斯·曼自杀了,沃尔夫自杀了;当启蒙精神所期许的道德理想国沉沦,而启蒙精神又一再显示出它的狰狞面目之时,荷尔德林疯了,斯威夫特疯了,尼采疯了。在中国,当用事无门、超脱无望、诗国破灭之际,王国维自杀了。人类历史在20世纪的揭幕阶段对诗人实在太过残酷。在这残酷的处境里,诗人何为?诗意何在?传统的价值信靠业已成灰,新建的理性王国也不那么可靠:上帝不是死了么?启蒙不是走向了反面么?孔孟不都成了封建遗毒么?庄禅不是无政府主义么?那么,怎么办?当20世纪中西文化传统双双遭遇危机之际,中西方诗人栖止生命、对抗虚无的价值信恃从何处承领?在这一问题的起始处,中西精神的对话已然不可避免。

然而对话的结果怎样?海德格尔并不企望东方精神在欧洲精神世界中有多大作为:(“现代技术世界在世界上什么地

方出现,转变也只能从这个地方准备出来。我深信,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学或其他东方世界观发生。”^①);弗洛姆皈依禅宗之后仍念念不忘那个来自于上帝传统的“爱”的信念;叔本华固然近于庄禅,却宣示了生死边界的虚假,并终于归复到古希腊理性澄明之境的彼岸。另一方面,西方精神之进入中国也不顺畅。先是伴随启蒙理性大举犯境的人本精神的张扬,然而王国维自杀了,朱湘自杀了;接着是革命历史进化论或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扎根,然而老舍自杀了;继而是在西方精神参照下企图回复淳朴与平静的现代田园诉求,然而海子自杀了;未了,是在现世价值混乱与浊恶围攻下不惜退缩于幻想与童话的艰难一搏,然而顾城自杀了。在这场精神的对话中,诗人接二连三的自杀毫不客气地宣示出对话的艰难与困境。逼迫我们不得不追问:汉语思想的现代使命到底是什么?在众多传统与现代的价值信恃都变得晦暗不明之时,何处才能找到人之在生存提供普遍价值信恃的出路?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最好先回头看一看这段由诗人自杀连缀而成的败退路痕。

一 王国维与朱湘:近代人本主义道路的困境

1927年6月,王国维纵身跳下昆明湖,生前他说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尔”。1933年12月,朱湘带着半瓶酒下肚后的醺醺醉意跳入了长江,生前他说道:“凭了这支笔,我要呼唤玄妙的憧憬”。他们生前一个服膺叔本华,一个在赴死当日还倚着船舷诵读海涅的诗。一个将死的时日选在端午节,两千多年前大诗人屈原在同一天投了汨罗江;一个亡在采石矶,一千多年前也是一位大诗人李白据说在同一个地方捞月未果,葬身洪流。这实在耐人寻味。一个两肩上一边站着屈原,一边站着叔本华;一个襟抱里一侧溶着李白,一侧溶着海涅。中国传统精神与西方近代人本精神偶一相撞,竟然一下撞出了两具诗人的浮尸。中西精神的对话起步当真如此艰难?既然传统的价值信念已然不可挽救,既然诗人在偏离传统精神后所昭示的无非是冰冷的死亡,既然历史适逢其时的提供出一次与西方精神对话并极有可能从中找寻到新的价值信恃的机会,为什么还要选择死亡?实际上,王国维与朱湘并非没有真切地观照过这伴随着启蒙理性而来的西方近代人本主义精神,否则他们不会邂逅叔本华与海涅。

王国维当然不单纯是一个诗人,在更重要的意义上他是一个传统士大夫。但这个士大夫不同寻常,他喜爱西方“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并对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深有会心。王国维之死是由于内在精神上的痛苦

和家庭上不幸的遭遇,使其对生生死死看得较为轻淡;悲观的人生哲学,抑郁的性格,使其害怕社会变革。可见,王国维的思想视野中既有传统士大夫所禀持的君子人格又有近代人本精神之个我诉求。起初他安然书斋,虽然乍逢世变、颠沛流离,至少还能稳身于书斋的寂寞窗棂,精神世界里的传统情结与近代人本精神尚可相濡以沫、水火相济。此种情形下,不必自杀。但不幸的是他却废帝征召了。任“南书房行走”,“赏食五品俸”,“着在紫禁城骑马”。“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罗雪堂参事六十寿诗》)他以一介布衣骤为帝师,竟要全身心来报“天上”之知遇隆恩。在儒家信念里君子人格的完善自足必然伴随着历史王道的实现,公正的社会秩序也端赖君子人格的确立。所以孔子才有“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的从政担当,孟子也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的豪情与抱负。总之,“内圣”统领“外王”,“外王”不过是“内圣”的实现手段与外在表彰。值此荣耀“侍讲”,拜领恩宠之际,王国维自以为目下尽可以己之“内圣”佐帝之“外王”,君子人格的完善指日可待。“达则兼济天下”,但问题是,他要兼济的这个“天下”早已不是帝国时期的“天下”了。王国维基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君子人格的完善诉求势必在现实世界的围剿中碰得粉碎。因为对此际的天下与黎民来说,王氏的诉求无异于谵妄的梦呓。这样,王国维就“确在无比严肃的寻求一种‘道德的自我完善’,惜乎此种严肃业已转化为可悲的荒谬。”^⑤

幸好他还有叔本华。但叔本华又给了他怎样的慰抚?叔本华嘲笑自杀。王国维不也对《红楼梦》里金钏、司棋、尤三姐的自杀充满了不屑么?何以一个不屑于自杀的诗人,自己却自杀了?问题在于叔本华自己就自相矛盾。“既然生存世界没有意义可言,有什么理由嘲笑退场的人?”^⑥无所住心的人,一个了悟了人世苦难而置身其外的人从容赴死岂非也是一种解脱。王国维说:“苟无此欲,则自杀亦未始非解脱之一者也。”当王国维执求的君子人格完善破灭之际,他已然被推搡到一种“无此欲”的处境。那么自杀就变得顺理成章。

举凡遭逢这种情形,人往往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信念之路,一条是审美之路。近代人本主义精神在传统价值信恃普遍沦弃之际,为人类提供的也不外乎这两条路。在前一条道路上,它提供的信念无非是安于虚无、担当荒诞,人在摆脱神明的把持后自己竟在虚无的深渊里越陷越深,王国维倒在了这条信念之路上。在后一条道路上,朱湘隐遁于审美的王国,狂饮生命的浊醪,即便愁似潮水也只好以惺忪醉眼迷然一视,转头继续溺于纵饮狂歌,却不幸仍与这个荒诞的世界一起沦落。朱湘一度沉溺,沉溺于“青春的热情”,沉溺于“游子的哀愁”,沉溺于“愤世的孤高”,甚至幻想在沉溺中“死个枫叶的红灿灿的狂舞天空”(《秋》)。朱湘既涉足了中国传统诗人的意境与格调,又在新诗的世界里流连忘返。他固然没有出路问题,却在旧诗的清虚与新诗的哀愁里难以安处。他不得不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摸索出与传统信念完全不同的新信念,要么反省历史中的传统观念,审察时代自身的境况,修复古典精神信念的基础。”^⑦栖身域外的经历使他明白摸索新信念并不容易。因为西人在对新信念的百年摸索中到头来难免撞上了荒诞的墙。而国内的处境又使他深感修复古典信念基础的不合时宜。在此岸深壑的边际堆砌的精神资源里,古人恬静的诗

情已然丧失了依据,单吟一首《采莲曲》“小船呀轻摇 杨柳呀风里颠摇”,不过是在这荒废的家园里烧一把祭奠的纸钱。近代人本精神让人在洞见了世界的荒诞后带着人尚未平复的本然裂伤与这个荒诞的世界终生厮守。如此以来,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义?“我弃了这个世界,世界也弃了我。”审美的沉溺终于在沉溺里投了长江。这样,近代人本精神的另一端——审美之路也走向了迷途。

二 海子之死:现代田园道路的迷失

80年代汉语世界告别革命,迎头与一个饱满的物质世界撞了个满怀。工具理性主导的西方现代性诉求取代革命诉求以丰腴的物质期许一度使人心满意足。人们的价值凭靠似乎被物欲的沉迷接管。诗人在体察内在精神资源时,忽然发现自己竟然陷入了一种可怕荒芜。此际一度热闹起来的存在主义与卡夫卡,一个要求人们要有足够的冷酷心智来担当荒诞,但相信虚无毕竟不是一种笃实可靠的价值凭恃;一个在写作中存活,妄图靠写作逃逸虚无。“写作乃是一种甜蜜的美妙报偿”(卡夫卡),但不幸这报偿竟是“替魔鬼效劳”(卡夫卡)。诗人发现自己虽然在写作中安生,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与现世的罪恶、冷漠相伴。诗人如秋日里一片干枯的黄叶,终于活不下去了。汉语思想在新的历史时空里仍难以从汹涌的西方精神中攫取一杯安顿生命的琼浆。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海子自杀了。这是一个耸动人心的场景。海子在山海关的铁轨上躺下,身侧一面是土石砖瓦铸就的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伟大象征——长城,一面是吐着滚滚黑烟呼啸而来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卓越标识——火车。在一条灰黄的土石长龙与一条漆黑的钢铁长龙即将碰撞的刹那,诗人躺下了!他一边静视那土石长龙上空淡蓝的天际,一边感受着那钢铁长龙轰隆有力的躯体震颤。在平静的注视与躁动的感受中,诗人安然受死,身旁的《圣经》飘荡起几纸卷曲的书页,《瓦尔登湖》泛起层层涟漪。诗人原是要为逝去的农耕田园献上一篇沉痛的末文,向孔武有力而又凌乱不堪的现代世界下一纸惨烈的檄文,同时也为自己的诗意生存寻找依据。他开始真心憧憬田园的安适与淳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身处现世的杂乱,诗人虚构出一方诗意田园,不管这个田园何等清虚,比起浮戾的现世,即便有难言的无聊也胜过现世精神的裂伤所带来的苦楚。在这里,海子的田园已不独是传统文化中供人隐遁的去处,那个田园毕竟掺和了太多矫情的牢骚与伪饰的达观。海子的田园是透视过现代文明浊恶的人借以终极凭靠的家园,这里既有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沉思,又有叶赛宁在历史必然与古朴田园之间抉择的两难。这个田园并不平静。在这个并不平静的田园里将息的诗人精神难免再次流浪。一旦再次流浪,便不得不承受绝望。“绝望之神,你在何方? / 我是谁手里磨刀的石块? / 我为何要把赤子带进海洋”。(《你为什么不在沙漠上》)诗人在寻访绝望之神的旅途质问,是什么使我非得退缩在诗国里找一份宁静?如果现代文明与历史理性真的只能带来无穷无尽的罪恶,那么诗人必会义无反顾地走向土石长城与现代田园。但问题是,那个钢铁长龙不也曾期许下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愿景么?为了那个美好的愿景而暂时忍受其实现过程中抛下的污秽、罪恶不

也合情合理么?到底回归田园还是相信历史必然性的意义?诗人陷入了抉择之苦。既找不到复归古朴田园的坚固理由,又无法确定现代文明与历史必然意义的可靠,诗人只有在土石长龙与钢铁长龙的交汇处躺下。

三 顾城之死: 童话幻想道路的破产

中西文化对话到顾城这里已经宣判了它的破产。他濒临这样一种处境:“百年千年的文化乱致一团……我不由自主地在这个漩涡里回转,最后是达到一个疯狂的境地。”(《从自我到自然》)既往的诗人无法在中西精神的废园栖居,中西精神的这场对话看来注定难以会通。那么何如将这一切抛置脑后,结束在中西精神世界里的艰难勘探,只以一种孩童般的目光打量这个新奇的世界,构筑起高于世界的明澈天国?顾城的“天国”确实足够明澈。那里既有在童年缅怀中满含忧伤的美丽乡愁。“小巷/又弯又长/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小巷》);又有孩子般单纯奇幻的任性涂抹。“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除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更有美丽、洁白、充满了童真色彩的爱情。“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画下所有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画下想象中/我的爱人/她没有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她永远看着我/永远”(《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顾城以一种成人特有的童年感伤期望人与自然和谐安处。然而,现实总是难遂人愿。当情人不再着迷于他高蹈的天国花园而宁愿回复现实的沉重甚至浊恶之时,当妻子不堪忍受他所营造的那种生命不可承受的轻飘而决意离他而去之时,他的童话世界再也难以安宁。这无异于向众人宣读了一张处决诗人的判决书。诗人的纯净世界终于没有照亮存在的深渊,不得不怀疑自己一度沉迷的童话是否真的有意义。一旦追问开始,诗人将无可避免地被推搡到信恃沦丧,价值虚无的深渊。诗人在中西文化纠结的混沌中拒绝从两者的精神府库中购买拙劣的价值凭恃,而不惜以生命为赌注开掘出一块栖止身心的领地。如今自己所创造的新信念也在现实的进攻中撞缺了四角,那个荒诞的梦魇还是悄无声息地降临到诗人头上。诗人将何去何从?

无路可走的诗人一旦从童话、幻想的天国迫降现世。现实的纷纷攘攘、红尘的俗事器器只能使他精神崩溃。“当一个人无路可逃时,如果他不是一个真正虔诚的宗教徒,那么即使他原本是一个善良的人,也挡不住灵魂深处冒出凶残的邪恶来。”^⑥诗人终是举起一柄利斧砍向了自己的妻子——他似乎觉得他诉诸于凶杀乃是为了正义,为了那被妻子、情人所践踏的纯净世界。该隐在自己的牺牲不为上帝悦纳后,也向自己的兄弟扬起了杀戮的手,据说也是为了正义,为了恢复自己被践踏的权利。然而,该隐杀兄后毕竟可以永沐上帝神恩的圣光,而我们的诗人在杀妻之后却找不到倾听自己忏悔的上帝,只好在一枝光秃的树丫上吊死。诗人唱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一代人》)如今光明不再,诗人黑色眼睛里只有无助和哀伤。

结语: 传统文化的现代使命

西方精神进入汉语思想世界,既未能补救中国传统思想信仰缺失的状况,也未能作为有效的参照使汉语思想中的传

统精神重新焕发活力。在历史文化语境的不断变换中,人之现世生存的价值问题,濒临价值的凌乱与虚无生命何往的问题仍一次次以诗人自杀的形式提示着它们的存在。汉语思想确乎到了认真思考自己现代使命的关头。

仅就在世价值信念看,时下热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潮都难以成为汉语思想真正的现代使命。现代性发展到极端难免使人成为理性机器的部件,被强大的理性机器驯服,往往会放弃自己的道德自主与价值自为。如果说现代性可以息宁人之在世性价值追问的话,那么这种息宁的方式无非是使人将信仰的追索与价值的关怀交付给一个超个人的理性裁判机构。“其后果可能是信仰、情感、道德情操与伦理关怀的完全缄默与冷淡和对自我道德判断权利的拒绝。”^⑦这样以来,诗人在价值虚无的深渊悲苦的哀号与泣血的泪眼将变得毫无意义,大可不必庸人自扰般玩命地执拗于价值信恃的探寻,只需俯首听命、静待一个理性授权的道德权威通过精细盘算与周密算计为我们发放一个看上去绝对可靠的价值信念。

后现代肯定自我,维护多元与差异。但在这个自由的空间里,“信念”却是个隐晦词。神圣的信念与世俗的信念都难免向我们课取精神世界的赋税,自杀的诗人将生命抵作税款竟还兀自不知,何其愚妄乃尔!生命不过是一场游戏、一个梦,现世的刺激、沉迷、狂欢才有沉实的意义。后现代发展到一定程度,游戏的自我升天,道德的自我入地。

把个我的在世性价值交付给现代性授权的权威,人固然有了一个庄严的归属,却也不堪其重,在深重的压抑感中,人们呼求自由。在后现代生活空间里,人以肉感的沉醉取消价值追寻的高蹈,卸下满身的重荷狂歌曼舞却时感悬着浮游的恐惧、无家可归的冰冷,又无法不在无法承受之轻中渴慕归属。汉语思想的现代使命既不是思考如何禀有提供现世沉重的权柄,也不是探求如何使人置身失重的游戏空间,而是为现世提供一个足可承受的在体性裂伤,足可抱慰徘徊在价值虚无的边际孤苦无告的灵魂的真实价值信恃。弗若姆说,人之生存难免生死的两歧。如何使国人在中西传统价值都遭到否弃的情形下,在现世无意义的存活中不走向死亡,才是汉语思想真正的现代使命。刘小枫把这一使命的实现寄托于曾与人类共历苦难的上帝神恩,希图以神性的拯救精神抚抱现代国人的精神裂伤。毕竟我们与西方精神的遭遇中恰恰遗漏了基督。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中西精神对话中基督教的救赎思想尚未接受汉语思想语境的检验。那么上帝满怀悲悯的神恩当真能使汉语思想获得足以宁息国人灵魂躁栗的信恃么?

不知道。

注:

①④⑤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48、72页。

②李刚:《王国维死因三说与新探》,《求索》,2007年第2期,181页。

③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2页。

⑥孙绍振:《挑剔文坛——孙绍振如是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⑦刘新锁:《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伦理之可能》,《读书》,2006年第3期,90-96页。

(责任编辑:南 桥)